

HISTORY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中国现代化史

第一卷 1800~1949

许纪霖 陈达凯 主编

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三联书店

HISTORY OF MODERNIZATION IN CHINA

中国现代化史

第一卷 1800~1949

许纪霖 陈达凯 主编



(沪)新登字 117 号

中国现代化史 第一卷 1800~1949

主 编/许纪霖 陈达凯

责任编辑/冯芝祥 赵立新

装帧设计/桑 桑

责任制作/钱震华

责任校对/李厚安

出 版/生活·读书·新知 上海三联书店

(200020) 中国上海市绍兴路 7 号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上海三联书店·学林出版社联合发行部

(200020) 中国上海市永嘉路 25 弄 8 号

制 版/上海弗士特文通电脑应用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制/上海中华印刷厂

版 次/199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199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425,000

印 张/19.25

印 数/1—5000

ISBN7-5426-0837-1 ISBN7-5426-0838-X
K·57 定价:27.80 元(平) K·58 定价:29.80 元(精)

目 录

总 论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许纪霖)

(学林出版社 陈达凯)

中国现代化的启动类型与反应性质 ·····	1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主题与运作背景 ·····	5
政治变迁中权力聚散的历史循环 ·····	9
社会经济的二元结构 ·····	15
社会分层与现代化动力群体 ·····	18
文化危机与思想冲突 ·····	24

第一章 巨变前的社会经济景观

(《深圳特区经济》杂志社 何清涟)

前现代化的经济结构 ·····	31
工商业的发展和市场的渗透 ·····	35
人口压力下社会经济的病变 ·····	39
中国与世界的贸易 ·····	42

已27/01

第二章 新思潮的萌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李长莉)

传统文化观念与明清士风	50
“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与西学东渐	54
洋务思潮与“尚富强”的新价值观念	61
“中体西用”思想模式中价值观念的对峙	67

第三章 危机中的政治嬗变

(南京大学历史系 朱庆葆)

传统的政治文化与政治秩序	74
西方冲击下政治传统的裂变	81
王权危机之一:太平天国运动	89
王权危机之二:地方势力的增长	94

第四章 中国工业化的发轫

(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吴柏均)

外资近代化企业的建立	104
工业化中的国营企业与政府作用	107
私营企业的产生和发展	112
二元的工业发展道路	115

第五章 士大夫的流产变革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杨念群)

政治嬗变的前提	125
---------	-----

维新群体之三大政治变革模式及其后果 ·····	128
戊戌变革的社会氛围 ·····	140
维新运动的回响:中国近代变革的双重取向 ·····	151

第六章 社会经济结构的二元化

(《深圳特区经济》杂志社 何清涟)

新型社会集团的出现 ·····	156
通商口岸:中国的现代化中心 ·····	166
《马关条约》后的全方位开放 ·····	175
二元经济格局的形成 ·····	178

第七章 世纪转折点上的文化思潮

(中山大学历史系 陈少明)

旧传统与新思潮 ·····	184
古经新释:民族危机中的使命感 ·····	189
佛法入世及其结果 ·····	195
山呼海啸,西潮东卷 ·····	202

第八章 清末新政:从传统向近代的过渡

(学林出版社 陈达凯)

教育改革:从废科举到兴新学 ·····	212
新式军队的形成 ·····	219
预备立宪运动的进程 ·····	225
走向近代法制的开端 ·····	235

第九章 “新政”的替代物——革命

(南京大学历史系 李秀领)

晚清革命的中坚与社会基础 ·····	245
士绅阶层的政治疏离 ·····	250
地方势力的坐大与中央财政危机 ·····	256
保路运动和武昌起义 ·····	264

第十章 从民主政治到权威政治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孙立平)

清王朝的灭亡与政治社会的解体 ·····	270
南京临时政府的民主政治设计 ·····	276
袁世凯:从总统到皇帝 ·····	283

第十一章 文化变迁与价值重建运动

(浙江大学哲学社会学系 毛丹)

民初社会的价值紧张 ·····	293
以《新青年》为核心的启蒙思想家 ·····	299
打倒“孔家店”与“文学革命” ·····	305
从人性批判到社会改造 ·····	313

第十二章 北洋政府时期的经济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杜恂诚)

军阀政府对经济的失控 ·····	323
产业和金融业的发展 ·····	330

经济环境和企业家的进取精神 ·····	340
资产阶级团体及其政治影响的加强 ·····	346

第十三章 “五四”后的社会文化思潮

(浙江大学哲学社会学系 高力克)

社会改造思潮的勃兴 ·····	351
“问题”与“主义”之争 ·····	356
文化保守主义的崛起 ·····	361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	370

第十四章 军绅政权和国民革命

(南京师范大学马列部 王 跃)

权力危机中的军绅政权 ·····	379
“法统”之争背后的权威真空 ·····	387
五卅运动:广泛的社会动员 ·····	395
国民党领导下的国民革命 ·····	400

第十五章 国民政府权威的建立与困境

(南京大学历史系 高 华)

“以党治国”的党治国家模式 ·····	404
国民党政权面临的三重挑战 ·····	410
脆弱的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的结构 ·····	415
行政机构的建立与社会控制的强化 ·····	422
专家参政:政治参与的有限度开放 ·····	425

第十六章 南京政府的十年经济

(复旦大学经济系 施正康)

中产阶级的忧虑和民间工业的盛衰 ·····	429
发展国家资本和开发国防工业 ·····	435
银行改组和金融资本的国家化 ·····	440
币制改革带来的经济繁荣 ·····	444

第十七章 现代化变迁中的土地改革

(南京大学历史系 张益民)

国民政府对农村渗透的失败 ·····	452
国民党的土改与顿挫 ·····	456
中国共产党的农民革命 ·····	462
改造乡村道路的多元探索 ·····	468

第十八章 主体文化与文化主体的颠覆

(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 贾新民)

国民党的党治文化运动 ·····	478
中国共产党主体文化变革的奠基性努力 ·····	483
自由知识分子的文化努力 ·····	491

第十九章 国民政府的战时集权

(四川大学历史系 陈廷湘)

战时集权体制的建立与强化 ·····	503
政治过程制度化的努力 ·····	508

权力实际运行过程中的无序化 ·····	514
集权面临的挑战 ·····	519

第二十章 战时统制经济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系 刘方健)

战时经济下的资源分配与商品输入 ·····	528
统制经济对民间工业的影响 ·····	532
国家资本的畸形发展与结构性腐败中的官僚资本 ·····	540
从通货膨胀到财政总危机 ·····	547

第二十一章 文化的价值重建与政治抉择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高瑞泉)

终极关怀的玄学重建 ·····	556
自由主义的理念 ·····	564
权威主义的恶性变形 ·····	572
新民主主义文化及其胜利 ·····	577

第二十二章 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衰败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 许纪霖)

战后重建政治共同体的失败尝试 ·····	582
昙花一现的战后自由主义运动 ·····	586
国民党组织的自我解体 ·····	594

后 记

总 论

在我们所要论述的1800—1949年这个时间段落里，古老的中国经历了其开天辟地以来最为惊心动魄的冲撞和变迁。令人鼓舞的是，中国的历史终于摆脱了治乱相替千年循环的怪圈的缠绕，展示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指向，这就是迎面走向全球性的现代化浪潮。

中国现代化的启动类型与反应性质

美国比较现代化学者布莱克(C. E. Black)指出：在人类历史中，有三次伟大的革命性转变。第一次革命性转变发生在100万年前，原始生命经过亿万年的进化以后，出现了人类；第二次革命性转变是人类从原始状态进入文明社会；而第三次革命性转变则是近几个世纪正在经历中的事，全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国家从农业文明或游牧文明逐渐过渡到工业文明。*

我们将人类历史上第三次大转变理解为现代化。在这里，“现代化”是一个活生生的动态性概念。它与“现代性”不同，它不是指后者所象征的那个静态的文明结构，而意味着一种连续，一个过

* 参见布莱克：《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1—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程,一个当代世界正在持续着的历史演进。

从全球范围来看,人类的第一、二次大转变是在各个地域或各个民族相互隔绝、彼此孤立的状态下个别实现的。而第三次大转变的情形恰恰相反。由于知识爆炸、科技进步和工业革命所提供的客观要素,现代化不能不具有世界性的弥散和扩张性质。它在地球的某一区域首先突破,然后伴随着血与火强行扩散到世界的每一角落。历史也确实如此。现代化首先从西欧开始,随之通过殖民化弥散到美洲、澳洲、亚洲和非洲广大地区。因为如此,现代化在历史上又被称之为欧化、西化或工业化。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说来,它们可以是等值的,但和后面那些概念相比较,现代化也无疑有着更丰富、更深刻的内涵。现代化并非一个简单的向欧美国家的认同过程,其间必然蕴含着每个国家在各自的历史文化视野中对现代化的不同价值取向和模式选择。现代化也不仅仅是生产方式的转变或工艺技术的进步,它是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变迁过程中文明结构的重新塑造,是包括经济、社会、政治、文化诸层面在内的全方位转型。

由于人类第三次革命性转变特有的弥散、扩张性质,因此不同国家现代化历程的起步时间以及启动方式是各不相同的。美国社会学家M.列维将其分为“内源发展者”和“后来者”两大类型,即“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区别。前者以英、美、法国等为典型个案。这些国家现代化早在16、17世纪就开始起步;现代化的最初启动因素都源自本社会内部,是其自身历史的绵延。后者包括德国、俄国、日本以及当今世界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现代化大多迟至19世纪才开始起步;最初的诱发和刺激因素主要源自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的示范效应。*显然,中

* 关于早发内生型和后发外生型两类现代化的概念,孙立平作了很好的界定和分野。详见《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剖析》,载《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国的现代化也是属于这一类型的。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是从19世纪开始进入由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的现代化过程的。西方世界的霸权威胁与文明示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启动要素。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现代化的变迁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冲击—反应”过程。对于中国来说，它既是古老的历史在新世纪的骤然断裂，又是这一历史在以往的传统中静悄悄的绵延。事实上，早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二百年，西方的宗教和科技对中国的渗透和影响就通过利玛窦、汤若望等人开始了，而19世纪上半叶清朝帝国内部的一系列社会动向也为以后的变革提供了历史和心理的前提。即使在1840年之后，作为历史象征的许多社会文化现象，如人口过剩，土地兼并，农民起义，地方武装割据，攘外与安内之争，文化上的激烈反传统，纲常名教的式微等等，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上绝非罕见，从形式和内容来看都只是历次皇朝更迭或权力转移过程中必然伴随的症候而已。事实上，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中国面对的主要问题还不是外部世界的挑战，而是源自内部的传统危机。倘若在过去，历史势必依照沿续二千年的自身逻辑消解和克服这些危机，进入新一轮王朝循环。只是到了19、20世纪，当西方的示范展示另一种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时，中国才对自身历史的内部挑战产生了一种多少是变化了的回应方式。这样，中国历史的内部要素与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叠加在一起共同制约着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与历史走向。基于这样的理论设定，中国现代化启动的历史象征不可能不是模糊的，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暂且将其上限追溯到19世纪初，从1800年这样一个没有明确时限和特定事件的事件开始。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冲击—反应”分析模式的全然失效。正如柯文(Paul A. Cohen)所指出的，将中国的问题作分层处理，也许是最恰当的。在外层带(就地理或文化而言)，诸如通商口岸、现

代工商业、大众传媒、基督教徒……的出现，确实是西方冲击的直接产物。在中层带，像太平天国革命、同治中兴、晚清新政、辛亥革命、联省自治、工农武装割据等等，都不是西方冲击的直接产物，而是经西方催化或赋予某种形式与方向的古老而又全新的历史现象。在内层带，如中国的人口、土地资源、内地和乡村的宗法关系、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底层的骚乱、匪患等等，两个世纪以来基本没有受到西方文明的感染，保持着自己亘古未变的外部标志与内在象征。*对不同层带的问题作不同的理解与阐释，有助于接近历史本来的真实。

一般而言，当我们说中国现代化的变迁受制于西方示范效应和历史传统辐射这双重变量时，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传统与现代”这样一种将传统等同为抗拒，现代理解为发展的二分法观点。事实上，现代化这一现实神话固然给人类带来了物质的繁荣、知识的爆炸和文明的进步，但在其演化的过程中也伴随着一系列负面效应：社会经济结构二元化的对峙，政治秩序的混乱，个人安全感的丧失，道德信仰的崩溃等等，现代化是“同时具有创新和破坏作用的过程，它既提供了新的机会，也可能使人类付出混乱和痛苦的极大代价。”^①同样，中国的历史文化固然给现代化的发展带来了众多负面的抗拒效应，但毋庸置疑的是，推动社会变迁的某些要素又是在中国自身的传统中提炼、转换而来的，诸如蕴含着现代“工具理性”的“经世致用”思想，在现代商品经济氛围中所激发起来的儒家资本主义精神，替代身份等级制的阶层流动与普遍成就取向，等等。在西方示范效应与中国历史遗产这一张力场中，各种要素此消彼长，生死存灭，重新组合，形成了错综复杂的

① 《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24页。

* 参见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40—42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格局，无论是西学还是传统，每一要素都有其特殊的边界条件，一旦超越临界点，其实际功能就向反面转化。因此，使后来的史学家们在为它们在现代化变迁中的角色功能定位时，不得不分外小心翼翼。

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主题与运作背景

关于现代化发展的一般阶段，国外学者有不少的阐释。如罗斯托(H.Rostow)提出过著名的经济成长五阶段说。相比较而言，布莱克的设定更具普遍性。他认为，所有现代化国家都必定面临以下几个阶段：第一，现代性的挑战——现代观念和制度，现代化拥护者的出现，这一切使社会在传统知识范围内遇到最初的对抗；第二，现代化领导的稳固——权力从传统领袖向现代领袖转移，在这一过程中，尖锐的革命斗争通常可达数代人之久；第三，经济和社会的转型——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达到这一程度：社会从农村以农业为主的生活方式转向城市以工业为主的生活方式；第四，社会整合——经济和社会转型导致了整个社会基本结构的重组。^{*}更概括地说，我们可以将上述四个阶段分为前后相续的两大历史段落：在回应挑战的基础上，重建政治共同体和实现以经济起飞为动力的文明结构转型。1949年前的中国，始终处于现代化发展的前期：外部世界的挑战出现了，社会内部的现代化因子和集团也在凝聚，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实现从传统领袖向现代领袖的权力转移，重新平衡社会资源配置，建立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高效率的、开放的政治共同体，为未来的经济起飞和文明结构全面转型创造前提。这是我们所要研究的这段历史的基本主题。

在一个半世纪的历史岁月里，中国现代化的运作背景是十分

^{*} 参见《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60页。

严酷的，这里面既有后发展国家普遍遭遇的困境，也存在着中国文明独特的沉重遗产。这些背景大致说来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庞大的人口过剩压力与自然资源的相对短缺。当中国现代化起步之始，全国的人口基数已突破4亿大关，虽然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减少了8000万人，但到清末又恢复到4亿人口的水平；民国以后尽管不断受到战乱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人口仍以较大的指数增长；到1949年，人口达到5.4亿。^{*}由于庞大的人口压力，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长期处于相对短缺的状态。维持国计民生的人均粮食产量，从1400年到20世纪中叶，长期保持不变或略有增长，其中最高的年份(1936年)人均粮食为650斤。^{**}由于全国荒地清代已基本开拓，以后的粮食总产量的增加只能靠改善耕作技术，提高单位产量来解决。进入20世纪以后，现代工业部门经济虽有增长，但到30年代中期仅占全国总产值的18.9%，加上第三产业也只有37.1%。^{***}农业仍是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人口增长是各国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在西欧，人口的增长与经济的起飞在时间上是同步的；但在中国，当现代化发展尚停留在经济起飞之前的前期阶段，就出现了基数可观的人口剧增，而且全国的自然资源又处于超负荷承载的状态；农村土地兼并趋势严重，农村过剩劳动力日趋增加；在现存的生产关系不能对之消化的情况下，就产生局部性的民变、匪患和骚动；如果遇上天灾人祸，就蔓延为大规模的农民暴动或农民起义。这种人地关系失衡，全国经济在饥谨与温饱临界点上徘徊摆动，社会安定或动乱受偶然性因素支配的现象，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末年的基本症候，也是改朝换代的时间象征和社会动荡的信号。当中国现代化在这样的自然历史背景

^{*} 参见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10、11章，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 参见D.H.珀金斯：《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 参见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4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下起步，其初始条件就较之他国更为苛刻：不仅国计民生的重心始终停留在应付温饱上，而且难以摆脱来自社会底层的潜在性的动乱威胁。

第二，亡国灭种的民族生存危机。作为后发外生型国家，中国现代化的启动从一开始就蒙上了沉重的困难和耻辱。在外国列强军事、外交、经济多重压力之下，民族的独立，领土的完整和国家的尊严始终受到严重的挑战。近代历史上几次重大的转折，从鸦片战争、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到护国战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一二·九”运动，无不与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尊严受到外来威胁有关。传统上，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是文化意义上的，他们认同的是一个外延可以推及天下的华夏文化共同体及其以此为统治合法性的世袭君王。当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打开锁闭的国门向世界开放以后，逐渐认识到中国不过是多元世界中的一个有限的政治实体，这就萌发了现代政治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而这种民族主义随着亡国灭种危机的加深也不断强化。在现代中国的变迁过程中，民族主义成为现代化的最有效的社会动员，成为凝聚人心、整合社会意识形态的象征。谁抓住了民族主义这面旗帜，谁就占据了领导现代化的精神制高点，掌握了统治中国改朝换代的合法性资源。清王朝、袁世凯和国民党合法性的丧失无不与“丧权辱国”有关，而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和中共革命的胜利，虽然意识形态各不相同，成功的背景与手段也有异，但其深层历史底蕴都带有民族主义倾向，这就使这些革命获得了改朝换代的现实合法性。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手段对中国现代化进程起到了神魔般的社会动员作用，同时，“民族主义常常淹没了现代化，并使之偏离主航道。”^①

第三，政治衰败、国家四分五裂的乱世局面。无论是西欧还是

^① 《现代化的动力：一个比较史的研究》，66页。